

◆ 张玉春 著

《史记》 版本研究



商務印書館

《史记》版本研究

张玉春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版本研究/张玉春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ISBN 7-100-03305-5

I. 史… II. 张… III. 史记-版本-研究
IV. 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25620号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出版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史记》版本研究

张玉春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05-5/K·700

2001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 22.00 元

序 一

《史记》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尤其在学术研究迅猛发展的今天,更有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要作和可作。而在我看来,出版一部《史记》的精校本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从《史记》问世以来,两千多年过去了。在这期间,经过屡次的传写、刊刻,《史记》中不知增加了多少讹误衍夺。要恢复《史记》的本来面貌已不可能,除非有一天忽然出土一部汉代的《史记》;但是,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尽可能减少在流传过程中所添加的错误的《史记》校本还是有希望做到的,而且就学术研究来说确也有此需要。

其实,前人对此也一再作过努力。远的不说,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现和纠正《史记》今本中的上述讹误;金陵书局所刊刻的《史记》三家注本是一个校刻都较严谨的本子,张文虎还专门作了《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更是在《史记》校刊上的值得称道的劳作;至于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则是这套受到不少人极力推崇的校点本的代表作。但同时也应该承认,这些成果固然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又都存在各自的不足与失误。这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其结果则是使这些成果与今天我们所期望的还有不小的距离。

就主观因素说,情况各各不同。例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就时或失于武断,而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则又颇受其影响。限于

2 《史记》版本研究

篇幅,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六国年表》的秦始皇三十四年一栏中有如下记载:“适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及)[取]南方越地。”(758页)根据该书卷首所交代的体例,()内字是现存《史记》的原字,但校点者认为它是错字,故以()来识别,[]内字则是校点者所认为的《史记》本来的字。如果我们根据这种意见来读这段记载,那就意味着秦始皇在这一年做了如下两件事情:把“治狱不直者”派遣去“筑长城”;攻取了“南方越地”。但《史记》现存各本于此处都作“及”,不作“取”,连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的底本同治金陵书局刻《史记》三家注本也是如此,不过金陵书局所刊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于此有一条校记:“《志疑》(指《史记志疑》。——引者)云:‘及’当作‘取’。”(卷二)所以标点本《史记》这里其实是根据梁玉绳的意见改的。但这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如下:“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戍。”“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按:“桂林、象郡、南海”即所谓“南越”,见《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而《史记·六国年表》这一年所记及的“南方越地”显然是《本纪》所说的“南越”。可见南越地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就已经取得了,至三十四年则对“治狱吏不直者”分别给予筑长城及戍南越的处分。《六国年表》的秦始皇三十四年栏中这个“及”字完全正确,梁玉绳要把它改作“取”字却无疑是错的。

像这一类的任意改动,就是我所说的由主观因素导致失误的一种。

至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是指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史记》许多重要版本(包括影印本),明清时期的《史记》校刻者以及有关的研

究者如梁玉绳、张文虎等都未能见到。由此而造成的阙失,当然都不是由主观上的不努力所造成的。例如日本藏古写本《史记·河渠书》残卷,有些文字可正今存《史记》宋刻及其以下诸本的讹误。如今本的“其后庄熊罴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中的“卤”字,宋刻本及明清诸本同,而日本残卷作“恶”(见罗振玉 1918 年所编《海东古籍丛残》之二《古写本史记残卷》影印本)。按,卤地即使得水也无法种植,自以“恶地”为是。但中国人知道此一残卷是从罗振玉开始的,其时已将近辛亥革命了。现在所见到的明清刻本《史记》及那一时代的有关研究著作自不可能用此一残卷去纠正这个错刻的“卤”字,这就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总之,由于这些主客观的因素,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通过精心校勘、广泛吸取现存《史记》各本的长处、不任意改动原文并保留各种重要异文的《史记》整理本。这样的整理本可以成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其本身也是《史记》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

但是,要作成这样一种《史记》整理本,真是谈何容易。其第一步工作,必须对现存《史记》各本的情况展开认真细致的调查,了解其重要版本的特点,梳理相互间的关系,理清版本演变的脉络,然后才能制订工作的具体方案。

这第一步的工作极为艰苦,非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不可。一般学者恐怕都不愿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何况现在学术界还存在着浮躁之风。想不到的是张玉春博士竟在此际写成了《〈史记〉版本研究》,并希望我写一篇序。此书虽不只是为我上面所说的那项工作而写,但却可说是它的第一步已经因此而走过了。

在这部书中,张玉春博士探讨了《史记》的原始版本以及从魏

4 《史记》版本研究

晋、唐代直至宋、明时期的《史记》各种版本的演变、从三家注各自单行到出现二家注合刻以至三家注合刻的过程,并对现存的从六朝残本到明刻本的《史记》各重要版本的情况及其长处作了细致的考评,于现藏日本的古写本及宋刻本述介尤详。其精细、审慎都使我深为赞叹。而在读了此书的稿本以后,我更感到了上述的那种《史记》整理本的必要。有那么多重要版本可以纠正通行的《史记》三家注本之失,而且光就此书所举的例证来看,也可以知道必须纠正的失误实在不少,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去进行这一工作呢?同时,此书还提供了—个重要的信息:三家注本从一开始就是书贾所制作的一个颇为粗率的本子。因此,为读者的方便计,新的整理本虽仍应是三家合刻的形式,但其整理工作绝不应只限于三家注本的范围,最好先能整理出一个《史记集解》定本,再进而整理出《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的定本,最后才形成《史记》三家注的新整理本。如此才能真正博采众本之长,而又不失《集解》、《索隐》的各自特色。

当然,张玉春博士此书乃是一部版本学方面的专著,就版本学的角度而论,也是学有专工、成就卓著之作。不过,我最近因重读《史记》,深感对《史记》有重加整理的必要,所以我的这篇序文就成为专谈此书对整理《史记》的意义了。离题之咎,尚望作者与读者原谅。

章培恒

2001年6月26日

注:《序》作者章培恒先生现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序 二

《史记》的成书,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记事“至太初而讫”来推断,大约是在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前101年)或其后不久完成的。在其后的一千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直至公元994年(北宋太宗淳化五年)才有《史记》的雕版印刷本。自从那以后至今,又已一千余年。现在存世的《史记》各种不同版本(不含抄本)大约有六十余种。这中间有“集解”单刻本,有“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有“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还有白文无注本。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版本多而承传关系最为复杂、难于理清的一种。对于不同版本的《史记》异文,历代学者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清代学者用力最勤,清同治年间的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是一部校订《史记》异文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而由唐仁寿、张文虎等校定的金陵书局本《史记》是明、清所刻三家注《史记》中最好的一种。但是,金陵书局本的《史记》在校勘上的问题仍然很多,原因之一是他们没能理清《史记》版本的不同系统与承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异文的判断。

进入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学者们才渐渐重视对《史记》版本源流的研究。1926年王重民先生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了《史记版本和参考书》,1931年赵澄先生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

6 《史记》版本研究

《史记版本考》。这两篇文章,前者过于简明,后者过于倚重历代书目的著录而未能亲自目验《史记》的各种版本。1958年贺次君先生的《史记书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六十余种现存《史记》版本做了逐一考察,记述详实,而于版本间承传关系和版本系统所论甚少。进入八十年代,连续出现了几篇研究《史记》版本的论文,引起海内外同行的注目。日本学者池田英雄在他的《〈史记〉学研究五十年》一书中对此做了评价:“1986年,吴汝煜发表《史记版本略史》。转年1987年,发表了易梦醇的《史记版本考索》和安平秋的《史记版本述要》两篇优秀的论文。两人都阐明了《史记》各本间的关系、探讨了古本的源流及对后世版本的影响,系统说明了两千年间《史记》承传的轨迹。”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对于《史记》版本的研究才步入了佳境。但是对于《史记》版本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最具版本价值的《史记》宋元刊本,据初步统计,存世的有14种,31部(包括残本)。其中,中国大陆所藏为10种,16部;中国台北藏4种,6部;日本藏7种,9部。(其中三地种数有重复)日本所藏的一部南宋刊朱中奉本是和中国和世界各国都不存的孤本;元代彭寅翁刊本,日本存有全部130卷全本,而国内(包括大陆与台湾)均是补配本。可见日本所藏《史记》宋元版的版本价值之重要。而过去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日本及中国台北的《史记》宋元本,或从书目、书影上,或从复制的部分胶片上作分析与比勘,未能亲自目验原书,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大陆学者对《史记》版本研究的全面性和权威性。因此,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所藏有版本价值的《史记》各本作一通盘研究与梳理就成为必须要做的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

张玉春博士就是在上述前人对《史记》版本研究的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经过数年的努力,几度到日本目验《史记》重要版本,与国内所藏《史记》版本作了详细的比较,并重新梳理版本关系之后,写成了这部《史记版本研究》。

张玉春博士的《史记版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一是由于作者对中日两国现存的《史记》主要抄本、刻本作了通观目验、重点比勘和通盘比较,并据此梳理出历代《史记》版本的承传关系与发展轨迹,因而使这部论著成为扎实可信的、超越前人的力作。张玉春博士通晓日语,他在九十年代后几年,在日本遍访日本所藏各种《史记》版本,尤其对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所藏两种宋刻本与他所搜集到的其他宋刻本的复印件作了逐字逐句的比勘,并吸收了八十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研究《史记》版本的成果,而使他的这部论著成为在二十世纪末尾完成的一部对一百年来《史记》版本研究的总结之作。二是作者在论著中有创获、有新见,纠正了前人研究的疏误。如书中首次论证了日本杏雨书屋所藏北宋本为北宋原刻本,而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其覆刻本;首次提出了南宋三家注黄善夫本是在二家注蔡梦弼本基础上,合以“正义”注文而成;首次论析了元代彭寅翁本三家注注文脱落,是因所据底本注文残缺,并不是有意的大幅删削,纠正了贺次君先生和我过去论断的失误。仅此上述两点,即可看出《史记版本研究》于《史记》研究的贡献,也同时奠定了张玉春博士在《史记》研究领域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的无可置疑的学术地位。

我与玉春相识有年,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他的这部专著即是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时的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当时那篇论文已

8 《史记》版本研究

被评为北京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而修改后的专著较前更为严谨。
值他的专著出版之际,邀我写序,成此一篇,谨以复命。

安 平 秋

二〇〇一年七月九日晨三点

注:《序》文作者安平秋先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

内容简介

《史记》版本研究是《史记》研究的基础，亦是《史记》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以历代史志及公、私书目为线索，以现存写本、刻本为依据，在考察各本文本形态的基础上，根据校核各本所得异文，对《史记》版本系统展开研究，首次构筑了《史记》版本系统的框架。本书通过对唐及唐以前《史记》写本状况的考察，得出在魏晋时期《史记》就已产生众多异本，虽未形成系统，但已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唐代沿承其绪，是为《史记》的写本阶段。至宋代，对《史记》写本进行了综合校理，由写本过渡到刻本，论证了刻本对写本的继承是整体上的继承，写本与刻本间无不同系统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北宋、南宋诸本的成因及演变轨迹，亦探讨了元、明主要刊本的版本承传系统。经过本书论证，澄清了前人对《史记》版本源流的某些模糊认识，匡正了以往版本学界对《史记》版本的种种错误论断，客观地揭示了《史记》版本的承传系统。

作者简介

张玉春，男，原籍辽宁省阜新市，1952年11月7日生于内蒙古突泉县，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读完小学、中学。197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79年至1982年师从孙常叙教授攻读古文字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安平秋教授攻读古典文献学，1999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暨南大学文化史籍研究所，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献、文学及文化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老子译注》（巴蜀书社）、《古代民间文学丛书》（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著作九部，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史记》版本流传存佚研究	8
第一节 《史记》的原始版本及流传	9
第二节 历代《史记》版本著录考	13
第二章 《史记》魏晋六朝异本研究	37
第一节 《史记》魏晋六朝异本状况考	37
第二节 《史记》魏晋六朝异本特点研究	46
第三节 《史记》六朝残本考	58
第三章 《史记》唐写本研究	66
第一节 敦煌石窟藏本考	67
第二节 传世唐写本考	77
第三节 《史记索隐》与《史记》唐写本	90
第四章 《史记》北宋刻本研究	106
第一节 《史记》刊刻之始	106
第二节 十行《史记集解》本考	109
第三节 十四行《史记集解》本考	129
第四节 杏雨藏本与景祐本关系考	154

2 《史记》版本研究

第五章 《史记》南宋刻本研究	166
第一节 十二行《史记集解》本考	167
第二节 九行《史记集解》本考	181
第三节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史记集解》考	198
第四节 《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考	206
第五节 黄善夫三家注合刻本考	235
第六章 《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研究	264
第一节 元彭寅翁刊三家注本系统考	264
第二节 明廖铠本与“嘉靖三刻”三家注本系统考	275
第三节 明南北国子监刊三家注合刻本系统考	308
结 语	335
参考文献	340
后 记	345
附 录	347

引 言

《史记》自问世以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与瑰玮奇变的文采,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自东汉至今,研究《史记》的专著已达近三百部,论文多达三千五百余篇,这在古代史籍文献研究中是较为罕见的。《史记》版本研究是《史记》文献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亦是《史记》研究的基础,本书在考察《史记》产生以来抄写刊刻状况的基础上,研究诸本异同,揭示各本间的相互关系及承继源流,进而论证《史记》的版本系统。

自汉至唐,《史记》皆为写本,宋淳化年间以后,《史记》始有雕版。叶德辉说:“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故《史记》版本研究含写本、刻本两部分。《史记》诞生到现在二千余年间,广泛流传,产生了众多写本、刻本。众本之间文字或同或异,妨碍了《史记》的正确利用。《史记》版本研究的目的是探寻更为接近《史记》原貌的本子,为后人正确利用《史记》奠定可信的基础。

司马迁撰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至汉宣帝时,其外孙杨恽始对外宣布,而《史记》得以广泛流传是在魏晋时期,因相互传抄,文字舛乱,各本之间多不相同。《史记》各本,因所据底本不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版本系统。六朝时期的《史记》写本,除仅存二篇残卷外,余皆不存。关于《史记》版本的较早著作是晋末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

2 《史记》版本研究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徐广还没有真正进行《史记》的版本研究,仅是收集了众本异同的资料。即便如此,这项工作对《史记》版本研究具有开创之功也是不容否认的。南朝宋裴驥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著《史记集解》,亦对《史记》的不同版本有所记载。依据《史记》注文中的材料,亦可窥其涯略,进而作深入研究,或可揭示这一时期的《史记》版本状况。至唐代,《史记》得到了积极的推崇,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加之裴驥的《史记集解》,构成《史记》三家注,奠定了“《史记》学”的基础。但在版本研究方面没有进展,只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兼列诸本异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记》版本状况。

宋代是雕版兴盛时期,《史记》在此时与写本告别,有了刻本。刻本的产生,标志《史记》版本开始定型。宋朝曾多次雕版印刷《史记》,但多数亡佚。这一时期是版本研究的开创期。具体表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开始记载书籍的版本形态。而兼列诸本异同,始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藏书家目录大多仿此书,为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仍主要局限于藏书家的著录方面,多侧重于宋元本的文本形态的考究,对文字的讹误状况与版本承继关系尚少涉及。在这一点上,清代的藏书家与明代藏书家无大异。版本学是兴起较晚的一门学科,明清时代的藏书家、版本家对专书的版本研究,只局限于传统的目录学框架里,是不全面的,若不与校勘学相结合,则难以澄清该书的版本系统。因此版本研究不仅仅是文本形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字异同的研究。这就要求必须与校勘学、目录学有机结合起来。如此方能有助于理清一